

民工荒、技工短缺与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建立的临界点

王国辉¹, 穆怀忠²

(1. 辽宁工程技术大学工商管理学院, 辽宁 阜新 123000; 2. 武汉大学社会保障研究中心, 湖北 武汉 430000)

摘要: 本文把农民工的乡城迁移分成三个阶段, 分析了中国二元经济结构与农民工迁移的关系及导致中国民工荒和技工短缺的原因, 运用制度变迁的有关理论分析了农民工的退出所导致民工荒和技工短缺对政府建立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的成本收益的影响, 并通过把目前城乡收入状况与中国发生重大制度变迁的 1978 年情况作对比, 认为目前的民工荒和技工短缺是制度变革达到临界点的标志。

关键词: 民工荒; 社会保障

中图分类号: D632.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4149 (2005) 04-0013-07

Lack of Peasant Worker, Technical Worker and the Critical Point for Establishing Social Security Institution for Peasant Worker

WANG Guo_hui, MU Huai_zhong

- (1. Population Research Institute of Liaoning University Liaoning Shenyang City, Business and Management School of Liaoning Technical University Fuxin City Liaoning 123000;
2. Liaoning University Liaoning Shenyang City, 110036; Social Security Research Center of Wuhan University Wuhan City Hubei 430000)

Abstract: The paper divides the rural-urban migration of China into three parts to analyz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ual economy and peasant workers' migration, and the reason that lead to the lack of peasant workers and technical workers. Depending on the theory of institutional change, the paper analyze the impact of lacking of peasant and technical workers on the governmental profit and cost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social security institution for peasant workers. The paper also showed it's the indicator of critical point for institutional reform that is lacking of peasant and technical workers, after comparing the condition of rural-urban gap at present with that in 1978.

Keywords: Lack of Peasant Worker, Social Security

一、引言

2004 年的中国劳动力市场有两个现象引人注目: 一个是民工荒,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课题组 2004 年 10 月《关于民工短缺的调查报告》显示, 在珠三角、闽东南、浙东南等加工制造业聚集地区, 估计缺工 10% 左右; 另一个是技工短缺,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 2004 年 4 月对全国 40 个城市

收稿日期: 2004-11-30; 修订日期: 2005-06-03

作者简介: 王国辉 (1971-), 男, 黑龙江省望奎人, 辽宁工程技术大学工商管理学院, 副教授, 辽宁大学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学 2002 级博士研究生。

技能人才状况抽样调查的结果显示, 技师和高级技师占全部技术工人的比例不到 4%, 而企业需求的比例是 14% 以上, 供求之间存在较大差距。

对于民工荒和技工短缺的原因专家们有不同的解释。劳动和社会保障部课题组认为, 是农民工工资待遇长期徘徊、劳工权益缺乏保障、企业用工迅速扩张、经济增长模式面临变革等多种原因造成局部地区民工短缺。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曹和平教授等经济学家认为是农时和农村收入增加, 提高了农民工在城市打工的机会成本, 造成农民工短缺^[1]。中国人民大学的唐忠教授认为应从三个方面寻找原因, 即需求方的需求供给方能否满足、信息不对称和工资太低^[2]。应对民工荒专家们开出的药方是: 改善用工环境, 维护劳动者权益; 完善就业服务体系, 发展跨地区劳务合作; 通过典型示范, 引导企业准确把握当前劳动力市场形势, 改进其用工行为。对于技工短缺的原因,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课题组认为主要是: 现行教育体制重学历教育、轻技能培训, 企业对员工的培训投入不够, 只使用、不培养, 没有形成高技能人才的评价、激励和流动的机制等。

民工荒和技工短缺这两个现象初看起来联系不大, 专家分析的原因也各不相同, 但实际上这两个现象是有联系的。技工的需求方主要是制造业企业, 而目前制造业产业工人的主体已经是农民工了, 因此技工短缺实际上是目前农民工的人力资本不足的问题, 是农民工供给的质量和结构不适应企业需求的问题; 而民工荒是在目前的工资条件下, 农民工的数量供给不足的问题; 因此, 这两个现象实际上可以归纳为同一个问题, 即农民工的数量和质量不适应中国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发展, 其背后的原因也是相同的, 即农民工的非市民化问题导致的农民工的数量和质量不适合目前中国经济的发展。本文的第二部分从二元经济转换入手分析中国乡城迁移的特点及导致农民工非市民化的原因; 第三部分分析农民工不能在城市永久定居如何影响农民工个人和企业的人力资本投资。进而导致民工荒和技工短缺; 第四部分从制度变迁入手, 分析了民工荒和技工短缺实际上是农民和农民工在中国目前城市偏向政策不能给农民和农民工带来利益增进而又无力促使政府改变政策的情况下的一种消极的“退出”, 这次“退出”会改变城乡二元社会保障制度的均衡, 因此可能标志着一个新的制度变革的临界点的到来, 是建立和完善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的一个好时机; 第五部分对全文进行了总结。

二、二元经济结构、乡城人口迁移与农民工的非市民化

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一个共同特点, 是发展中国家从传统社会迈向现代社会的必经的过渡形态; 我国由于长期实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和严格的城乡分割政策, 使中国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特征比其他发展中国家更加突出。首先,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巨大, 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中期, 城乡居民收入比率, 高收入国家为 1.38, 上中等收入国家为 1.49, 下中等收入国家为 1.51, 低收入国家为 2.43, 全球平均为 1.58^[3], 而新中国成立后, 我国的这一比率通常在 2~3 之间波动, 2003 年为 3.23^①, 在全球范围内处于高位; 其次, 城镇和农村发展水平差距很大, 几乎处在不同的时代, 这导致城市的生活费用非常高; 第三, 农村居民的物质资本、人力资本远远低于城镇居民, 截止 2002 年 6 月底, 中国城市居民家庭财产户均达 22.83 万元, 而每个农户 2002 年却被生产和生活所迫必须借款 1414 元^[4], 2000 年中国城市居民的受教育年限达到 12.2 年, 而农村居民仅达到 7.7 年, 二者相差近 5 年^[5]; 第四, 城乡之间制度分割依然存在, 在城镇企业工作的数以千万计的农民工几乎不能得到任何社会保障, 反而还要交纳名目繁多的税费。

中国二元经济社会结构的这种独特状况决定了中国乡城人口迁移的独特性: 和其他大部分发展中国家乡城迁移一次完成不同, 中国的乡城迁移被分成从农村迁移出去、在城市打工和在城市永久定居三个各自独立的阶段, 并在这三个阶段表现出不同的特点。

① 2003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的数据计算得出。

第一个阶段，从农村到城市打工的人口数量非常巨大，近几年已经达到 1 亿左右^①。这可以通过传统的人口迁移理论得到很好的解释，因为按照传统人口迁移理论，发展中国家城乡收入差距是导致城乡迁移的一个最重要的因素，如前所述，中国的城乡差距几乎是世界上最大的，这必然导致乡城大量的人口迁移。第二个阶段，农民工在城市打工的数量也很大，但打工时间长短不一，稳定性较差，经常发生回流现象，农民工在城市的生活状态既区别于传统的农民，又和真正的城市居民不同，处于一种边缘状态。第三个阶段，一小部分农民工完全适应了城市，在城市永久定居，成为真正的市民。目前，中国绝大部分乡城迁移人口仅停留在前两个阶段，仅有一小部分的乡城迁移人口能够完成第三个阶段，成为真正的城里人。从表 1 可以看出，在 20 世纪 90 年代末期，中国乡城迁移人口数量已经达到了非常大的规模，但真正永久迁移到城市的却并不多；其中，2000 年到城镇打工的农村劳动力达 7643 万人，但城乡迁移量仅为 1348 万人^②，说明在乡城人口迁移中只有 1/6 左右的人能够变成市民。

表 1 1997~ 2000 年农村转移劳动力数量、转往城镇数量和城乡迁移量表		万人
年份	农村转移劳动力转往城镇数	城乡迁移量
1997	4461	561.06
1998	5482	758.11
1999	6683	1024.35
2000	7643	1348.11

资料来源：1. 城乡迁移量数据转引自“四普至五普间中国城镇人口增长构成分析”，王放，《人口研究》2004 年 3 期。
2. 农村转移劳动力转往城镇数转引自《2002 年：中国人口与劳动问题报告》63 页，蔡 主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年 6 月第 1 版。

中国乡城人口迁移的第二阶段和第三阶段的状态和特点从传统的乡城迁移理论中很难找到合理解释，答案需到中国独特的二元经济社会结构中去寻求。

在长期的城市偏向政策和城乡差距等因素的作用下，农村居民的各种资本远远低于城镇居民，而城市的生活费用远远高于农村，两方面共同作用，导致了绝大部分乡城迁移人口在目前的条件下根本不可能在城市永久定居、成为真正的市民，“非不为也，乃不能也”。我们可以简单的算一笔账：首先，如果农民家庭想永久在城市定居，一般情况下应先在城市购买住房，目前，中国三大城市带的中心城市房价平均为 6780 元/平方米，大城市（省会城市）为 4300 元/平方米，中等城市为 2050 元/平方米，小县城为 1110 元/平方米^①，2002 年农户家庭节余为 2100 元^②，一年的节余仅能够在中等城市购买 1 平方米的住房，而需 2~ 3 年的收入节余才能在大城市购买 1 平方米住房；因此，大部分农民工不可能在大中城市买得起住房；其次，假如农民工不在城镇购买住房，而是在城市中租房，表 2 列出了这种情况下农民工家庭在各类城市中的市民化成本，假设农民工家庭的劳动力在城市中都能够找到工作，按照每个农民工在城市每月平均工资为 600 元计算^③，则一个农民工家庭在城镇的年收入平均为 19872 元（2002 年中国农户平均拥有 2.76 个劳动力^④），简单的对比一下农民工家庭定居城市的成本和收入，我们就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对于一个普通的农民工家庭在中等以上城市定居是不太可能的，在小县城即使能够定居，生活也将十分困难的。

因此，在目前的条件下中国城乡人口迁移必然被分割成三个阶段，而直接表现出来的最突出的特点就是乡城的非永久性迁移和农民工的非市民化，这会给城市劳动力市场带来许多重要的影响。

① 韦曙林等估计为 9900 万左右，参见韦曙林、许经勇，透过“民工荒”现象看其问题的本质 [J]，新华文摘，2005（7）：31。
② 城乡迁移量是指户口迁移，说明迁移者已永久在城市定居，数据为上一年 11 月 1 日至本年 10 月 31 日之间的数量。

表 2 目前我国农民市民化的成本细表

元

城市类型	人均生活成本 (A)	人均智力成本 (B)	人均自我保障成本 (C)	家庭居住成本 (D)	制度歧视性成本 (E)	家庭总成本 [F]
超大城市	6000	644	152	19200	5236	52593
大城市	3600	187	107	9600	5236	30918
中等城市	2400	142	85	4080	5236	20165
小县城	1800	104	53	2880	5236	16198

资料来源：人均生活成本来自中国城市发展研究会（编）《中国城市年鉴 2002》，城市年鉴社出版，2002 年，第 183 页。人均智力成本来自牛文（主编）《中国城市发展报告 2001~ 2002》，2003 年第 149 页。人均自我保障成本来自《中国保险报》，2003 年 2 月 10 日。家庭居住成本 D= 12 个月× 调查样本城市的标准面积（80 平方米）的月住房租金（按表的城市类型排列，它们依次为 1600 元、800 元、340 元、240 元）。制度歧视性成本包括暂住证每人每年 188 元，劳动就业证每人每年 205 元，杂证杂费每人每年 100 元、假设每个农民工家庭有一个学生，上学额外收费为 3200~ 6200 元。考虑到不同城市，统一取最低值 3200 元。假设各种类型城市的制度歧视费相同，资料来自李培林主编，《中国农民工进城的社会经济分析》164 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年。家庭总成本 F= 4. 13×（A + B+ C）+ D+ E，其中，每家 4. 13 人来自 2002 年《中国统计年鉴》公布农户规模。

三、农民工非市民化与民工荒、技工短缺

农民工是理性的，在不能真正成为城里人的情况下，为了规避风险，增加收益，他们会保留在农村的承包地，处于一种亦工亦农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下，农民工在城市打工的成本和收益就会受到农业生产的特点、家庭状况、农村经济状况、城市经济状况等众多因素的影响，因而具有内在的强烈的不稳定性。

由于大部分农民工在农村承包土地，而农业生产的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季节性，在农闲季节农民工进城打工的机会成本几乎为零，而在农忙季节在城市打工的机会成本则会非常高，因此大部分农民工必然会随着农业生产季节的变化在城乡间往复流动。农民工的家庭一般都在农村，每年春节期间，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农民工在城市打工的心理成本会急速攀升，导致农民工不顾一切的潮水般的回乡，而使城市的许多企业，尤其是服务行业的企业叫苦不迭，但却没有任何办法。

农村经济状况也会对农民工打工产生一定的影响，当粮食涨价，农村的经济状况好转，进城打工的机会成本增加，则农民工的数量就会减少；而当农村经济不景气时，打工的机会成本下降，则进城打工的人数就会增加。农民工在城市的收入和生存状况也是影响农民工行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收入的增加、生活成本的降低及生存状态的改善都会增加进城打工的农民工的数量和在城市打工的时间，相反则会导致农民工数量的减少及在城市工作时间的缩短。2004 年国家非常重视“三农”问题，再加上粮食价格上涨幅度较大，农村税费改革等支农政策的出台，提高了农民工在城市打工的机会成本，而农民工目前在城市的工作条件和生存状态比较差，几乎不享受任何社会保障，这些都是导致农民工供给减少的原因。

此外，由于城市信息传递快捷、交通便利、企业管理先进、观念意识超前，那些没有知识技能的农村劳动者在城市通过参与到市场分工中去，学习到知识技能，更新了观念；因此乡城人口迁移被舒尔茨等经济学家认为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人力资本投资过程。这一点已被国内的一些研究所证明，例如，1995 年中国科学院人口研究所在山东济南调查的数据表明，普通打工者的第一位的收益选择“长见识、更新观念”的比例达 41. 08%。正常情况下，人力资本水平的增加应带来工资的增加，而与城市居民工资以平均每年超过 10% 的速度增加^[10]形成鲜明的对比，农民工的工资近十年几乎没有任何的增加，因此农民工的相对工资实际上是在减少，而农民工人力资本的增加还会增加其所在城市打工的机会成本，因为农民工人力资本的增加能够使农业产出更多。因此这也是民工荒的一个原因。

农民工的人力资本虽然会随着进城打工时间的延长而增加，但这种增加一般是一种自然的和自发的增加，增加的数量和质量不一定能够适应城市企业的需求，尤其是针对机械、电子等企业的专有人力资本很可能是非常不足的。事实情况也确实如此，由于农民工的非市民化导致的不稳

定状态，农民工会经常更换企业，因此企业一般不会和农民工签长期合同，不会给农民工提供社会保障，这反过来又刺激了农民工的不稳定。在这种情况下，企业是不会有投资为农民工进行技能培训的激励的，因为农民工的频繁流动，对农民工进行技能培训有很强的外部性，农民工一旦离开企业，企业对农民工的技能培训投资就难以收回。由于农民工对在企业长期工作和在城市永久定居的预期非常低，他们预期可能经常会被赶出城市和被企业辞退，因此，农民工也没有投资去进行技能培训的激励，因为不能在城市定居，一旦回到农村，对技能培训的投资就不能收回，变成沉没成本。因此农民工的人力资本投资处于一种自发状态，积累的速度较慢，且专有性和针对性较差，不能适应目前城市工业的需求结构。

因此农民工的非市民化导致了一个理性的农民工和企业虽追求自身效用和利润最大化，却最终二者和整个社会利益都受损的“囚徒困境”。这个状态为政府介入提供了激励和理由。

四、民工荒、技工短缺与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变革的时机

既然导致民工荒和技工短缺的深层原因是农民工的非市民化，那么有效解决民工荒和技工短缺的关键就是使农民工真正市民化。“解铃还需系铃人”，农民工的非市民化是由政府长期实施的城市偏向政策导致二元经济转换滞后、造成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反差过大的结果，而实践证明，这样的二元结构状况，仅靠市场不但不能解决问题，而且还会使问题不断恶化，有关理论、现实和其他国家经验都证明政府的参与是必须的。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可用的手段不多。目前，通过社会保障进行收入再分配，对农民工市民化进行促进，是一种比较现实的选择。

改变原有的二元社会保障体系，建立和完善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象其他制度变革一样是一种制度变迁。制度变迁受很多因素的影响，但各种因素的影响一般最终可以归结为制度需求方和供给方两个因素的影响。制度具有公共物品的性质，供给方一般为政府，而“在政策形成的政治市场上，政府也是一个具有经济理性的当事人，按照最小化政治成本最大化政治收益的原则行事”^[1]；因此，政府只有在制度变迁的预期收益大于预期成本时，才可能有建立新制度的激励。而影响政府的成本和收益的因素很多，但最主要的应该是制度需求方因素的变化，当新制度的需求者群体的力量逐渐壮大，其行为对其他主体的利益的影响达到一定的程度时，会使制度供给者建立新制度的收益超过放弃旧制度的成本，就会达到制度变革的临界点，就可能导致制度变迁。对于新制度的需求者，一般可以有两种方式对制度变迁的各利益主体施加影响：一种方式是，制度需求方通过投票或主动的呼声和要求对制度供给方施加影响；另一种方式是，当制度需求方通过第一种方式不能对供给方产生足够的影响时，则制度需求方也可以通过退出现有制度，对制度供给方施加影响。这种方式，一些经济学家称之为“退出”，退出机制是一种无奈的选择，但在某种情况下却也是很有效的。

按照政治经济学公共选择理论传统，政府推动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变迁的模型可用图1来表示。横轴表示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和实施水平，纵轴表示政府的边际收益和边际成本，曲线MR表示政府增加农民工社会保障水平的边际收益曲线。政府的边际收益被定义为社会稳定、经济发展、得到选民的支持和拥护。由于随着农民工社会保障水平的提高，逐渐接近城市社会保障水平，这项政策的边际收益会越来越少，因此假设MR的斜率为负是合理的。另一方面，政府的边际成本MC被定义为建立和完善农民工社会保障所面临的反对、风险和压力，建立和完善农民工社会保障的水平和努力越高，所面临的反对、风险和压力越大，因此，边际成本曲线MC的斜率被假设是正的。当农民工社会保障这种具有公共品性质的制度提供水平达到这两条直线交叉点时政府的收益将达到最大。假设在时期T1，政府的农民工社会保障政策在边际成本MC1和边际收益MR1相等的水平P1达到均衡E1，此时政策强度为S1。由于社会保障制度的公共品性质具有外部性，政府或政府官员只能获得政策产生的利益的一部分，因此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也会像其他公共品一样，其供给一般会少于社会最优水平。而在时期T2，经济社会条件达到了制度变革的临界点，农民工退出城市化进程，退出城市部门，这会导致政府建立和完善农民工社会保

障制度以促进农民工市民化的政策的边际收益增加，边际成本降低，即 MR1 曲线向上移动到 MR2，MC1 曲线向下移动 MC2，从而达到新的均衡点 E2，此时制度变革将发生，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将被建立、完善，并达到新的水平 S2，S2 的水平将远大于 S1 的水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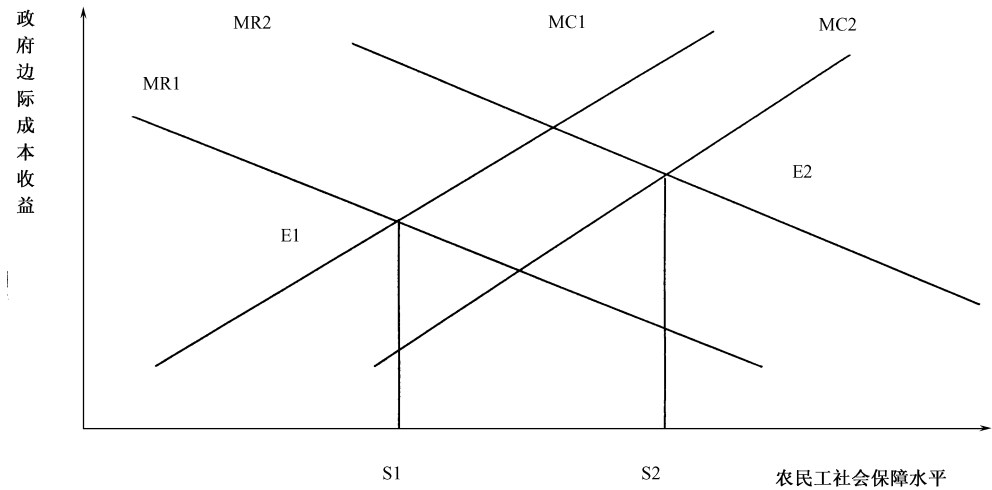


图 1 政府建立农民工社会保障边际成本收益图

那么，如何判断目前是否达到了制度变革的临界点呢？受国内著名经济学家蔡 先生的启发^[12]，由于 1978 年中国 7 亿农民消极退出集体制的农业生产，导致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建立；因此 1978 年城乡的收入差距及 1978 年前几年的城乡收入的相对增长率就应该具有一定的判断新的城市偏向制度变迁的临界点的功能。让我们比较一下 2003 年和 1978 年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和在这两个时间点前几年的农民和城市市民的收入增长率情况。如表 3 所示，1978 年前 8 年农民收入增长率一直低于城镇居民收入增长率，平均仅为城镇居民的 60%，城乡差距不断扩大，在 1978 年达 2.37 倍。而 1996~ 2003 年 8 年间农民的收入增长率也一直大大低于城镇居民的收入增长率，而城乡人均收入比率则不断加大，在 2003 年高达 3.23。从表 3 中还可以看出，城镇职工工资增长率在 1996 年至 2002 年间几乎每年都超过 10% 以上，而农民工的工资最近 10 年来几乎没有改变。可见，当前城乡差距状况及其变化趋势和 1978 年十分相似，甚至超过了 1978 年的水平，因此，这次农民工从城镇的退出，极有可能标志着制度变迁的临界点已经达到，可能是建

表 3 城乡收入增长率及城乡差别表

年份	城镇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 年增长率 (%)	农村居民 人纯收入 年增长率 (%)	城乡人均 收入比率 (倍)	年份	城镇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 年增长率 (%)	农村居民 人纯收入 年增长率 (%)	城乡人均 收入比率 (倍)	国有单位 职工工资 年增长率 (%)
1971	2.3	1.7	2.26	1996	13.0	22.1	2.47	17.3
1972	2.2	1.7	2.27	1997	6.6	8.5	2.47	11.6
1973	2.6	1.7	2.29	1998	5.1	3.4	2.51	7.4
1974	2.5	1.6	2.30	1999	7.9	2.2	2.65	6.1
1975	2.1	1.6	2.32	2000	6.4	2.1	2.78	11.4
1976	2.4	1.6	2.33	2001	8.5	4.2	2.90	11.8
1977	2.7	1.6	2.35	2002	13.4	4.8	3.11	17.0
1978	2.3	2.3	2.37	2003	9.0	4.3	3.23	-

资料来源：1970 年~ 1978 年的数据转引自《再论改革与发展中的收入分配》，64 页，陈宗胜、周云波著，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 年 8 月；1996 年~ 2003 年的数据根据每年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的数据整理所得；1996 年~ 2002 年城镇国有单位职工工资年增长率数据来自《2003 年中国劳动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2003 年 9 月。

立和完善农民工社会保障的一个好机会。

五、结论与讨论

本文从民工荒和技工短缺的现象出发,分析了民工荒和技工短缺的深层原因,得出以下结论:

1. 民工荒和技工短缺实际上是同一个问题,即农民工不能适应城市企业的需求。民工荒是在一定的价格下农民工供给数量不能满足企业需求数量的问题,而技工短缺是农民工的技能和素质不能适应企业需求结构的问题。

2. 中国的乡城人口迁移明显被分成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离开农村到城市打工,第二个阶段是在城市工作,但家庭仍在农村,一般在农村保留土地,而非城市的真正合法居民,即农民工的非市民化,这两个阶段由于城乡巨大的差距而导致非市民化的农民工的数量十分巨大。第三个阶段,农民工完全在城市定居,成为城市真正合法的居民,也是由于中国城乡的巨大差距,能够定居的农民工比例很小。这是中国城乡二元经济转换滞后的必然结果,反过来也可能会成为下一步中国二元经济顺利转换的阻力。

3. 农民工的非市民化必然导致目前出现的民工荒和技工短缺,而从某一个角度讲,民工荒和技工短缺是农民工对中国城市偏向制度的一种消极的反抗,或者叫“退出”,而这可能是建立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的一个非常好的契机。

参考文献:

- [1] 孙展. 刘英丽等. 民工对工厂说不——广东遭遇民工荒. 文摘报, 2004-08-29 (2186): 8.
- [2] 朱隽. 农民工开始用脚投票, 人民日报, 2004-10-10: 5.
- [3] 江小娟. 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 挑战与战略 [J]. 经济研究, 2004 (10): 1-6.
- [4] 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网站. 2003 年农村固定观察点农户数据按东、中、西部三大地带分组汇总. <http://www.rcrc.org.cn/RCRE/GDGQ/gdgcdata.htm>.
- [5] 蔡. 中国人口与劳动问题报告 [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2. 353.
- [6] 陈广桂. 房价农民市民化成本和我国的城市化 [J]. 中国农村经济, 2004 (3): 21.
- [7] 国家统计局. 2003 年中国劳动统计年鉴 [M]. 北京: 中国统计出版社, 2003. 121.
- [8] 姚远. 中国惊现“民工荒”的启示. 参考消息, 2004-8-24: 16.
- [9]、[10] 同 [7].
- [11] 蔡. 城乡收入差距与制度变革临界点 [J]. 中国社会科学: 2003 (5). 16-25.
- [12] 同 [11].

[责任编辑 童玉芬]

(上接第 80 页)

多样性和流动性。对于医疗保险个人账户的基金,除首先考虑满足医疗保健需求外,主要是制定基金投资运营的管理办法和政策,增强基金的抗风险能力。因而,可以考虑适当的、安全性较好的资金投资渠道。如除储蓄存款外,还可以考虑对医院建设的不动产投资、购买国债、企业债券,甚至股票等。

综上所述,我国医疗保险制度模式选择和运行分析表明,个人账户直接影响着医疗保险制度改革顺利、平稳进行和可持续发展,对保障人民群众健康保险需求,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本文从分析个人账户目前运行的实际情况入手,阐述了目前个人账户所面临的制度安排和运行管理上的问题,并就个人账户在现行模式和管理制度下,能否实现其费用控制和纵向积累进行了分析和思考,并设想了政策功能定位和解决办法。认为只要加强个人对自己未来健康的责任,定位好个人账户的政策功能,并制定科学合理的个人账户积累管理办法,采取积极的激励措施,个人账户积累是完全可以实现的,从而可以使个人账户发挥更大的医疗保障作用。

参考文献:

- [1] 赵小仕, 杜明霞. 现行个人账户制度低效率的经济学思考. 人口与经济, 2003, (1).
- [2] 李志刚, 崔佳颖. 关于医疗保险制度中个人账户问题的探讨. 中国劳动, 2003, (2).

[责任编辑 童玉芬]